

钟惺著述考

李先耕◎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钟惺著述考

李先耕◎著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钟惺著述考/李先耕著.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2008.8

ISBN 978 - 7 - 81129 - 099 - 8

I. 钟… II. 李… III. 钟惺(1574 ~ 1625) - 著作研究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8474 号

钟惺著述考

ZHONG XING ZHUSHU KAO

李先耕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 74 号 邮编 150080

电 话 0451 - 866086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黑龙江省委党校印刷厂

版 次 2008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30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29 - 099 - 8/I · 13

定 价 13.50 元

凡购买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钟惺著述考》
(项目编号11512089)
- 黑龙江大学重点学科经费资助

前言

钟惺(1574—1625年)^①,字伯敬,号退谷,祖籍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今江西永丰县),其高祖钟协祚始徙居湖广竟陵县皂市(今湖北天门市皂市镇)。钟惺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成进士,曾为行人、工部主事、南礼部仪制司主事、祠祭司郎中等闲散之官,后为福建提学金事,丁忧遭人言,家居而卒。他与同邑谭元春(1586—1637年)是“竟陵派”的领袖。二人评选的《古唐诗归》风行海内,“纸贵一时”(朱彝尊语)、“家置一编”(钱谦益语)、“拟钟伯敬体”的诗也在当时士人中流行。于是,钟惺的诗文及其编选评说之书有如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席卷中国,甚至旁及海外,各地书贾乘机大刻伪书。笔者曾经在《简论钟惺》^②一文中指出:

钟惺与竟陵派的影响不仅涉及纯文学领域,而且深入整个文化领域。邹漪流《启祯野乘·钟学宪传》写道:“公书既行于世,诸评断小语皆流布海内。窃附者或伪托以传,然莫能私焉。”当时,钟惺的诗文集及用他的名义编

① 钟惺卒年有两说,笔者考订为1625年,见《文学遗产》1987年第6期,现收为本书附录。

② 李先耕:《简论钟惺》,《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

选评阅之书有如一股不可遏止的洪流席卷全国，甚至旁及海外。各地书贾也乘机大刻伪书。郑振铎先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说：当时，“坊肆所刊，冒名为他所阅定的书籍，竟多至不可计数”。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以钟惺名义编选评阅的书籍多达百种，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而其真者不足十一（对此笔者另有专文论述）。像《周文归》、《秦汉文归》直至《国朝文归》以及《明诗归》、《名媛诗归》显然是受到《诗归》的影响而伪托的，而像《秦汉文怀》之类则是模仿《史怀》。这还可以属于当时的文学（或曰纯文学）领域，但还有两大类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许多署名钟惺编评的各种《通纪》、《编年》、《捷录》之类。这些书“在清初传诵最广”（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因为那些忙于背经书八股的士人没有时间读《通鉴》，更不用说卷数浩繁的正史了。用作伪者的话来说，就是“言简而事赅”，可以满足一般考试的需要。有趣的是，尽管那些以文坛领袖自居的人在骂钟惺的诗文是“亡国之音”，但这些以史为鉴的署名钟惺编著的书却极为流行。王士禛《池北偶谈》记载说：“坊间又有《皇明通纪》亦托名钟惺，内载左都御史曹思诚为魏忠贤建祠事。曹近刊冤揭云：‘与惺素无仇怨，惺何不自惺’等语。不知惺歿于天启乙丑，而坊贾伪托之也。曹氏遍诉京师，与惺为难，可发一笑。此康熙二十年事，去惺之歿已五十七年矣。”从这个笑话中，我们看到，钟惺死后近六十年，冒名伪托之书仍极流行，可见其影响的深长。另一类是托名钟惺批评的戏剧与通俗小说，它告诉我们，“伯敬先生”对俗文学的影响，丝毫不次于人们所熟悉的李贽与袁中郎。虽然我们至今没有发现钟惺真的评过小说或戏剧，但明末他的诗文集的编评者陆云龙却是小说的刊行、

批评者以及作者。陆的弟弟人龙则是新发现的《型世言》的作者。或许它可以说明,竟陵与公安两派,尽管在文学风格上相距较远,但在文学的解放上还是一致的。笔者曾经说过,钟惺的竟陵派是明代纯文学大树上最后的花朵,这是就“真的”钟惺的文学作品而言的。但是时代却强迫他扮演了他自己极不愿意充当的角色。当然,无所不在的“伯敬先生”是书贾借名人牟利的结果,但是,自以为主持风雅者与俗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对钟惺及竟陵派评价的差异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然而这样拥有巨大影响的作家及其流派后世却名声不显。这是因为钟惺死后不久而明亡,竟陵亦受到钱、朱以及顾炎武等人的斥责,而钟氏著述又经清廷查禁,流传渐稀,以至后来若干论及竟陵的人竟有并未读过钟谭之书者。甚至有人真伪莫辨,乱加评说。比如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与钟惺有关的条目中,竟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言其伪的《明诗归》、《名媛诗归》等书也列为钟惺编著^①。看来对钟惺著述,实有考证之必要。

本书就是当前对钟惺著述全面考证以求弄清真伪的著作。

^① 见李先耕:《〈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钟惺”条辨正》,《烟台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现亦收为本书附录。

目 录

第一章 钟惺诗文集考	1
一、《隐秀轩集》及《钟伯敬先生遗稿》、《翠娱阁评选钟伯敬先生合集》	1
二、《钟惺文钞》辨伪	20
第二章 钟惺编选评注诸书考	29
一、经部	29
二、史部	49
三、子部	73
四、集部	79
五、戏剧小说	95
六、结语	124
附录一：钟惺卒年辨正	127
附录二：《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钟惺”条辨正	131
附录三：庚戌科场案与东林党争	141
附录四：壬子顺天乡试案	157
后记	161

第一章 钟惺诗文集考

一、《隐秀轩集》及《钟伯敬先生遗稿》、《翠娱阁评选钟伯敬先生合集》

钟惺曾多次说过：“选而后作者，上也；作而自选者，次也；作而待人选者，又次也。”（《题鲁文恪诗选后》。见笔者与崔重庆合作点校的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之《隐秀轩集》，下文所引钟惺著作一般均见于此书，仅注出篇名。）这是钟惺在“执诗坛牛耳”（李维桢语）时的看法。钟惺曾回忆说：“庚戌以前诗，百不能存一。”（《隐秀轩集自序》）现存集中的“庚戌（1610年）以前诗”三四十首，则其原作当极可观。遗憾的是，随着以后钟惺“作而自选”的《隐秀轩集》的出现，那些早期诗文集似乎已荡然无存了。笔者于钟惺同乡先辈李维桢（字本宁）的《大泌山房集》卷二十一中，发现了李氏为钟惺早年一部诗集《玄对斋集》所作的序。现录于下：

余与钟伯敬孝廉上世皆自江右徙其地曰皂角市。市当四邑界可数千家，农十之三，贾十之七。自先通奉始以儒成进士，科第相踵，博士弟子员凡数十人，独于古文辞阒如也。即余尝备位史局，以滥吹斥，今且老，曾无一言窥作者之藩。而伯敬少余二十许岁，能工古文辞。余于

古文辞即不能，然窃好之。诸弟与犹子辈亦窃好之，而亟称诵伯敬所为古文辞。余盱衡击节，以为吾里山川灵秀菟积，不知几何年而始收之伯敬五寸之管，五色之豪。

今年少弟内史复以其《玄对斋集》视余使序。集中诗可百余篇，而汉魏六朝三唐语，若起其人于九京，口占而腕书者。余益骇叹非人间物也！闻于今称“海滨邹鲁”，然汉以前率名要荒。自唐欧阳詹起温陵，以文受知于常袞、陆贽、韩愈、李翱，造草昧而开文献，其功甚伟。吾里中乃有伯敬矣。伯敬龀而读李长源九岁诗，勃然乡往之。十一而薄塾师举子业，好《春秋内外传》、《史记》、《南华》及《昭明文选》、青莲、工部诸家言。塾师恚怒，卒不改。又不轻出一语，恐袭前人余唾。逾二十而后为诗，复以善病讽贝典，修禅观，智慧生，痰疾虚，空发光明，而所就若此，将释氏所谓宿因耶？欧阳生集行世，陈宓谓其发身僻远之乡，尚友命世之杰，举进士者以为称首，盖所重在此不在彼。夫一孝廉何足为伯敬重也？

序竟，余贻书责犹子：“伯敬，夫非尽人之子与？无若阿伯，悔不可追。”而伯敬复致书余：“士立身有本末，岂在浮名？明兴三李、济南北郡近于仲举性峻，先生近于太丘道广，以故士愿附齿牙者，往往借名之心多于请益。生人大业经世出世二物，小子实请事焉，而仅名文人才士。沉游大人成名，是谓我不成丈夫也。即不得已而名文人才士，其在何休不窥园十七年，司马子长游万里后乎？”

余益壮伯敬志而为书报之曰：“极知是集不足尽子，顾岁不我与矣。他日，人谓我生与子同里同时而不知子，我且有遗憾。第据子今日诗叙之，以子为里杓之人，不亦可乎！余不佞何所执而成名？伯敬目我太丘，幸甚。诚愿附伯敬集以行，比于析成子、北宫贞子生受之也。”

笔者曾经指出：“《玄对斋集序》大约作于万历三十二年之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秋，钟惺在‘困于诸生十二年’后，终于中举，而次年春闱下第。李维桢以乡先达的资格勉励他说‘夫一孝廉何足为伯敬重也’，这似乎合于此时的情况。李维桢说钟惺年‘逾二十而后为诗’，那么《玄对斋集》中的一百多首诗当为他1592年至1604(?)年这七八年中的作品。现存钟诗属于上述年代的，可考者仅《悬军》一首。诗言：‘闻道邢司马，悬军驻岛夷。’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丰臣秀吉再次入侵朝鲜，明廷先后派杨镐、邢玠入韩御倭。诗中的邢司马即邢玠，可见《悬军》即作于此时。这首诗可能是《玄对斋集》中仅存的硕果了。”在现存的书目文献中，笔者尚未发现《玄对斋集》的其他材料。

我们知道，钟惺高祖钟协祚（1442—1513年）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徙楚竟陵县皂市。李维桢先世亦由江西徙居湖广京山。序称钟为孝廉，言“夫一孝廉何足为伯敬重也”，则序当作于钟中乡试之万历三十一年之后，估计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序称钟“逾二十而后为诗”，而集中“诗可百余篇”。据沈德符（字景倩）《与谭友夏夜话》诗云：“予幼习楚人，中道得伯敬；示我玄对稿，序者曰谭柄。”沈氏生于万历六年，小于钟惺四岁。此“玄对稿”当即《玄对斋集》，然沈氏所见之本非李序乃谭序。考谭元春于1604年10月访钟惺，是为二人结交之始。然则沈氏所见之《玄对斋集》当在此后。是书似已不存。序中李维桢说自己“尝备位史局，以滥吹斥，今且老，曾无一言窥作者之藩”。这当然是一种谦虚。而接下去说“伯敬少余二十许岁，能工古文辞。余于古文辞即不能，然窃好之。诸弟与犹子辈亦窃好之，而亟称诵伯敬所为古文辞。余盱衡击节，以为吾里山川灵秀菀积，不知几何年而始收之伯敬五寸之管，五色之豪”。可以看出，这是李以同乡先辈资格所作出的奖励后进的姿态。而序文中，李维桢给我们描述了钟惺成长的经历，这是很可贵的。

序文最后一段用了两个典故，我们解释一下。《后汉书·许劭

传》说：“劭常到颍川，多长者之游，唯不候陈寔。又陈蕃丧妻还葬，乡人毕至，而劭独不往。或问其故。邵曰：‘太丘（陈寔曾任太丘长）道广，广则难周。仲举（陈蕃字仲举）性峻，峻则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李维桢说“伯敬目我太丘”，是说钟惺认为他像陈寔一样交游甚广，但未免有“难周”之病。《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在齐豹之乱中，北宫喜和析朱钺立了大功，于是，“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赐析朱钺谥曰‘成子’，而以齐氏之墓予之”。这是生谥，所以李维桢才说“比于析成子、北宫贞子生受之也”。李维桢用此典故，是说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看到钟惺成就大名，自己的序文也就能与钟惺的文集一起流行开来。两位不同辈分的同乡文人的心理还是很有意思的。

1610年春，钟惺得中万历三十八年庚戌榜进士。不久他把自己的时文编为《隐秀轩时义》，写下了自序（见《隐秀轩集》），并请吴兴唐宜之（名时）为之作序（见《与唐宜之》）。唐序笔者未见，自序当作于此年或稍后。此书似亦不存。但是钟惺的时文在当时还是很有影响的，许多八股文选集都收录了钟惺的文稿。今人龚笃清在《明代八股文史探》中，把钟惺列为“隆庆、万历时的八股文名家”，说他在当时“独树一帜”。书中引用陆云龙评论钟惺古文的话——“其锤炼、推敲，皆备良工之苦心者”，“苦于锻局”，“苦于修辞”，“宁简无繁，宁新无袭，宁厚无佻，宁灵无痴，工苦之后，还于自然”，认为这“同样表现在八股时文之中”。书中收录了钟惺两篇八股文，今遂录于下：

孔子曰诺

已去之时，圣人不讳言之也。

夫时之既去，圣人不能挽，亦何必讳哉，为孔子者，有诺而已。

今夫时者智力之所不得争，而老者圣贤之所莫能辞也。从古英豪，不免为既去之时，降心短气，而权奸之徒，亦时时挟此以摧抑天下士，若阳货之于孔子是矣。

然使货曰已逝，孔子必曰未逝。货曰不我与，孔子必曰吾与。欲与货争乎？抑与时争乎？而孔子政不必尔也，漫听而漫应之，曰：有是哉，大夫警我以已逝之日，而惜我以难得之年也。虽然，丘非敢忘也。

去日苦多，来日苦少，非惟大夫知之也，予亦已念之矣。往不可追，来不可必，非惟大夫命之也，予亦已深忧之矣。

谓不知老之将至者丘也，岂遂至耄而忘年！夫丘不尝曰吾衰已久乎？三年期月之思，正为此有尽之时悲也，感慨唏嘘，亦自有无可奈何者，即如大夫教云尔。

谓优游以卒岁者丘也，岂遂至乐而忘死！夫丘不尝曰假我数年乎？凤鸟河图之叹，正为此有穷之日忧也，俯仰悲怀，亦自有计无所出者，诚如大夫言云尔。

盖尝思去鲁，去卫，去齐，去楚，去陈蔡，栖栖皇皇，不知身之既老，而由今日以前一追思之，乃知此魁然七尺之躯，弹指于风尘辙迹之下，而逝者遂如斯也，往日之惜何必他日代为我计乎？

又尝赞《易》，删《书》，定《礼》，修《春秋》，矻矻孳孳，不知岁之几更，而由今日以后一逆数之，乃知此茫茫然百年之期，转盼于几席丹铅之间，而人寿复几何也。时命之衰，何必当途者过为我虑乎？

子夫夫往矣，吾知所自处矣。吾将仕矣，勿更为我忧矣。

象日以杀舜为事

舜之不幸，观其弟所有事者而已。

夫杀非仁人所忍言也，而日以为事，况施之于兄乎？舜亦不幸而有此弟矣。

且从古必无之人，必有一时有之；人生必无之事，必有一人为之，此固造物之戾气，生人之奇遭也。

所谓必无之人者何也？欲杀其兄之弟是也，其人未之前闻也。所谓必无之事者何也，弟欲杀其兄而日以为事者是也。其事吾尤未之前闻也，其惟舜之有象乎？

不易有者，日也。象之生，非此似无以为日。

不能无者，事也。象之日，非此似无以为事。

人之日营营，而有事者在，圣贤以此养亲、悦亲。象则曰，吾杀舜而牛羊父母矣，仓廩父母矣。所以养亲、悦亲之道，事有捷于此者乎？虽欲不日营营而不可得也，亦若舜之耕稼陶渔而已矣。

人之日劳劳，而有事者在，庸众以此自奉、自适。象则曰，吾杀舜而干戈朕、琴朕、弧朕矣，二嫂使治朕栖矣。所以自奉、自适之术，事有急于此者乎？虽欲不日劳劳而不可得也，亦若民之饮食作息而已矣。

未杀之先，曰谟谟者，始事者也，是象焦劳之日也，心思手足之所毕赴矣。

已杀之后，曰绩绩者，终事者也，是象受享之日也，身家子孙之所攸赖也。

夫象不足道也，舜岂堪一日有此弟哉！

1613年秋，钟惺任行人有使南之役，次年夏初回竟陵，九月再过夷陵，视座师雷思霈田墓。这次，钟惺与同行谭元春沿途所至有

诗,编为《西陵草》,其序见于《隐秀轩集》。其文曰:“万历甲寅九月,钟子再过夷陵,省座师雷先生家,为诸同门视其田墓事。先与谭子期京山,将从此寻太和旧约。计游事自西陵始,而不意以此终之。故其同游诗曰《西陵》。”《西陵草》今似亦不存,但在《隐秀轩集》中保存有其中之诗。如五古《秋晚荆门道中抵泉寺宿》、《再过夷陵为诸同门视雷先生后事题其阁上》,七古《玉泉寺铁塔歌》、《隋大业十一年镞歌》、《吉祥寺松下夜歌和友夏》,五律《夜观蒙惠二泉》、《群山万壑赴荆门》、《赠刘玄度孝廉为雷太史同年好友》,七律《泛江寻三游洞降观于峡》,五排《九日至玉泉与友夏居易登览宿于寺》,七绝《归经玉泉》、《归经蒙惠二泉》、《至京山与友夏别》等。谭元春之诗亦多见于现存集中,因非本书范围,故不录。可以说,《西陵草》即使亡逸而梗概犹存。

与此类似的是《舟岳集》。1616年8月,钟惺为行人已七年,用他的话说,是“以闲冷为常”,失意中他请假而南,与好友林古度、吴惟明一起舟行大运河至南京。途中10月登泰山,所作诗文是为《舟岳集》。在《舟岳集自序》(见《隐秀轩集》)中,钟惺说:“微舟则岱游几不成,予其何敢忘舟?故斯集也,亦始终于舟之诗,而《岱记》及诗在其中焉,曰《舟岳集》。谭子之集,仍用其自名曰《游首》,合刻之。”此合刻本今亦似不传。其诗亦同《西陵草》一样多保留在现存的诗文中。据笔者考辨,现在属《舟岳集》的诗文有,五古《入舟》、《舟月三首》、《赠徐象一年丈并索其画》、《登岱》、《无字碑》、《寻西天门》、《宿顶候日出》、《降自孔子崖循黄华洞止焉》、《傲来山》、《再憩朝阳洞泉上》、《岱草既定读友夏南岳记及诗》,七古《观日歌》,五律《泊》、《风阻蔡村念吴康虞候于前路》、《泊流河驿》、《九月十一日喜康虞入舟》、《自仙人桥观于舍身崖》、《岱归后示泰安州守侯君》、《十一月初二日雨》、《十一月晦夜初雪过潘稚恭江阁》,七律《九月五日天津舟泊和茂之见岸女簪菊之作》、《泊头逢虞伯醇孝廉同康虞茂之过饮常充符孝廉水楼留赠》、《岱游告成示

康虞茂之》，五排《戏题燕姬新入舟》、《舟次喜康虞先寄酒载醢诸口物到戏为六韵》、《恭谒阙里》。此外还有山水游记两篇：《岱记》、《阙里碑略记》。可以说，此书与《西陵草》一样，即使亡逸而梗概犹存。

钟集较为人知的是《隐秀轩集》。据康熙《景陵县志》载，隐秀轩是“钟惺读书处也”。“隐秀”一词出于《文心雕龙》：“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又据张戒《岁寒堂诗话》所引，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这同钟惺追求的风格相似，故取以为读书处之名，且以名集。

据《隐秀轩集自序》，此书“甲寅（1614年），友人林茂之为予刻之南都，无日不责予序”。直至丙辰（1616年），钟惺才写了这篇自序。但他对这一刻本并不满意。他说：“视其刻中所存今欲自去者，抑又甚多，盖岌岌乎有不能自存之势矣。”林为贫士，此刻本殆印数不多，今似无存。（钟序称，“予向者非无刻，刻非无序，今所刻之诗已尽去，而序乃无所附”。则前此除《玄对斋集》外，钟惺诗文仍当有集，不过已无法得知其详了。）

甲寅林古度南京刻本现已无从得见，而且也无从知其篇卷。现在所见是沈春泽（字雨若）天启间刻于南京的《隐秀轩集》。书前有沈氏写于“天启壬戌（1622年）六月”的《刻隐秀轩集序》。序称，这是在钟惺“既以视闽学政”后“自定其集”。沈本按文体编排，以《千字文》为序，起“天”迄“云”，共三十三集，文体依次为四言、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七排、五绝、六绝、七绝（以上为诗，共十集），赋、序、记、传、论、策、表、奏疏、启、书牋、疏、碑、行状、墓志铭、祭文、题跋、说、辨、书事、偈、颂、赞、铭（以上为文，共二十三集）。这就是《贩书偶记》所载之“无卷数，天启间刊，分天地……凡三十三集”本。这也是《西谛书目》所云“《隐秀轩集》五十一卷，十册，天启二年沈春泽刊本”。至于卷数不同，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查阅了西谛藏书之《隐秀轩集》后才弄清楚。原来沈本各文体所收诗文篇幅相差甚大，少的无法增加，多的却可再分。其分法一是再分类，

比如旻集是序,可再分为书籍序、诗文集序、时义序、赠贺序四类。二是同一文体按写作年代再分,如地集为五古,因多而分为地集一、二、三分集。当然也有分成小类后篇幅仍多而再分者,如诗文集序仍可分两部分,即“旻集二·序二·诗文集一”与“旻集三·序又二·诗文集二”。这样,若以最终所分计算,应为五十六个单位。西谛所藏之《隐秀轩集》因有若干单位遗逸(如“云集·铭”就失落),所以不足五十六而为“五十一卷”了。

笔者于黑龙江大学图书馆所见之《隐秀轩集》即沈刻本,半叶八行,十七字。此本收有钟惺写于天启三年的《游武夷山记》,为其他诸本所无。按,钟惺丁父忧去闽,途中于天启三年二月初八至初十游武夷,写下此记及二十六首诗。钟惺曾把这些诗文寄给好友徐波(字元叹),请他在苏州刊刻,以便赠人(此本今似不存,书名也无从得知)。沈氏或许于此得见《游武夷山记》,便刻板插入“辰集·记三”之后。但后来钟惺遭福建巡抚南居益疏劾,罪状之一即父丧中携妻妾游武夷,故此文只好不收。南居益疏于天启四年二月到京,则黑龙江大学藏本当刷印于天启三年夏到四年这一年中。而沈刻本据徐波《钟伯敬先生遗稿序》,实于天启三年刻于南京。一般书目据沈序定为天启二年,似稍早。

现在我们把沈春泽的《刻隐秀轩集序》逐录于下:

伯敬先生既以视闽学政,出哀其新旧所撰著诗文若干卷,合而名之曰《隐秀轩集》。自先生之以诗若文名世也,海内无不知有隐秀轩者;而隐秀轩之有集也,钟先生之所撰著不止于集之中,亦不尽出于集之外也。钟先生既以自定其集而手以授余,曰:“是亦可以传矣。夫不可传而求为可传者,世方不佞是藉焉,不佞何藉此也?故夫序之可以已也。”钟先生既不欲世有序《隐秀轩集》者,世实亦无有能序《隐秀轩集》者。抑泽也,支离憔悴人也。